

孟凡玉
著

假面真情

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
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孟凡玉
著

假面真情

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
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面真情: 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孟凡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39 - 4942 - 5

I. ①假… II. ①孟… III. ①傩文化—研究②民间音乐—研

究—安徽省 IV. ①K892. 24②J6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3506 号

假面真情

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著 者 孟凡玉

责任编辑 王红

封面设计 倩倩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978 - 7 - 5039 - 4942 - 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近些年艺术学科产生了一批成绩耀眼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的作者都是年轻的博士生，他们的背景是田野，田野中先有导师的足迹，后有弟子的脚步。那是一片历史烛照不到的地方，没有钢琴、没有舞池，却有成百上千地方社会的歌者、舞者和粉墨扮演者。那里的生活有谱系、生产有规矩、仪式有故事、戏曲有信仰。田野在“那里”，他们在“这里”。“这里”可以给“那里”打手机，通商贸，这一切都发生在距他们的呼吸不远的地方。但是一“田”之隔，却有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他们需要掌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理论，考察同时代存在的、不同文化样式和文化概念，使用合适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丰富的文化差异性，得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学术观点。这样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产出，就能用理论烛照历史，推进艺术学的研究。

本书的作者，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毕业的孟凡玉博士，正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田野在安徽贵池，他从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找我，记得论文封皮上的村社调查地名“荡里姚”三个字，一下子就跳入了我的神经，而不是单单跳入了我的眼睛。以后，我仔细地看了他的论文，答应参加了他的答辩会，现在又乐意在他的这本书写序，这期间，他花了六年时间修改他的论文，这种学风，我也欣赏。前辈所说“十年磨一剑”，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是从学子到学者所必要的蜕变时间。而作者所从事的艺术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比起艺术学本身的研究，也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而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正是充分解读和消化田野文化的时间，以求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差异从容地做出解释。说实话，我与作者不大认识，六年来只见过一面、

两面而已；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理论上又认识了很久。

现在需要具体而简要地谈谈这本书。我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样能解释作者所一直坚持的东西。这些东西产生于田野、历史与现代社会生活共生的宏观文化环境，因而其个性中必有共性。在作者的研究中，有诸多可谈的共性问题，但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使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属于我的专业，适合我来谈。以下，我就重点从这个角度，谈谈这本书的优点。

作者是一位艺术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按照他的排序，民俗学站到了艺术学的背后。而艺术学与民俗学的联系，正是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一种共性。当然艺术学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关联，只要看看早期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著作，都能找到这种历史。况且，在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中，还经常共用资料，共享理论和方法，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都证明了艺术是一座保存了地方、民族、语言、音声的独特成分的富矿。在我国，钟敬文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艺术学的民俗学研究。到了80年代，学术解放、文化宽松，傩戏研究拓展很快，钟先生还就他所谈的傩戏面具的研究与保护问题发表过文章^①。傩戏所涉及的戏曲、音乐、舞蹈、绘画、文博、考古等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也有各行专家的多种成果。本书作者的调查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拥有前人大量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

本书所依据的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本书的题目是《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不用说，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贵池荡里姚村。作者使用了个案法，对当地傩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主要运用音乐学等艺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做了交叉研究。作者对个案点的傩戏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符

^① 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艺术观，参见董晓萍《钟敬文的民间艺术学思想》，《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2年第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9—53页。

号，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作者的田野作业也不是一般地走过场，而是在田野定位、田野观察、田野关系、田野文本和田野研究等多个环节上，都贯彻得相当扎实。他将自己的敬业态度、专业志向和社会责任感都投入到田野中，一丝不苟地面对他观察的世界，也全方位地面对他所身处的文化组合的现代生活，这种个案研究便能成为全文研究的基础。

作者的研究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将音乐表演与文化表演结合起来讨论。作者以自己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提出的“仪式音乐”理念为基础，做了拓展研究。这种选题和实际研究不无冒险，但作者能将研究建立在一个以傩戏音乐为主线的“村落文化空间”学术资料系统上，能找到自己的新视角，并成功地将薛先生的理论给“荡里姚”个案化了，这就成功地完成了这项拓展研究。他还详细描述和讨论了安徽贵池傩戏中《孟姜女》的剧本，对啰哩哇和装饰音乐做了精彩分析。孟姜女是民俗学的经典题目，现在被他从音乐学的角度进行重新解释，让民俗学者也能接受，这也是从个案到共性的成功。

作者对自己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层次、有分寸的交代，这也是严肃的研究成果所必备的一部分。

从宏观层面说，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一般性启示呢？我认为，考察作者的这本书，结合其他艺术学科的同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类研究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一，仪式研究的核心价值。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看，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会被分为艺术的与非艺术的两大类，艺术学者要对其中的非艺术现象进行文化含义的研究，在一国艺术学中，这种文化便是民俗文化。对这种民俗文化要进行民俗学的研究。民俗学研究的深处便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传习方式是仪式。有了仪式，才能招徒弟、念经文、做表演。仪式让地方集体走近信仰世界，让他们将历史与现实融合，产生能说服自己的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仪式也是一个知识教育系统，但它脱离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外，而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中。但现代学者有时习惯于浪漫的想象，将多样化的、差异性的文化说得无忧无虑、热火朝

天，其实它们有时也狭隘、孤独和寂寞。正是在这种地方，仪式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成为照亮艺术的一缕强光。艺术表演对于保存民俗、宗教和仪式，是精神活动，也是物质传承，同时是形成初级社会组织的过程。在这些方面，仪式起核心作用，因为仪式对各种民俗承担者和宗教信仰者都有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第二，发现民俗知识的价值。从艺术学的视角研究文化，容易把民俗当作“知识”处理，再用变迁和发展的观点，解释各种非直接用于艺术活动的文化传承。作者大量描述了安徽贵池荡里姚正月期间上演的孟姜女傩戏的整体演出过程，介绍了相关家族、道士、科仪、日常器用和说唱文本，而这些描述和介绍无一不能脱离对当地“知识”的解释。作者在艺术的背后找到了民俗，其实就解释了这些知识。民俗学正是一种研究民众本身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价值观同一性的科学。作者还提供了本人在田野现场中，换位追求、理解和反观这种民俗知识的发现过程，这就是交代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经过与必要性。此外，作者认同提前进入民间社会的、非外来、非艺术的地方文化活动，这又会使个案与文献有矛盾。而这种交叉研究的特点，本来就不是说没矛盾，而是站在个案与文献两者之上，构建理论新格局。因为艺术学的研究一旦进入民俗，就会多元，就会有差异。描述多元和差异，就能揭示艺术的生命力，增加艺术学的活力。

第三，用考古学的眼光将古老艺术当作所有古老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艺术学，毕竟以研究艺术现象为主。但是，下田野，调查研究广大基层社会传承的民间艺术，发现了古老的艺术种类，艺术学者便容易使用考古学的观点，将这些古老艺术当作文物。这也使艺术学者接近民俗学，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以艺术形式传承的“礼仪、风俗、行为惯制、迷信、歌谣和谚语”^①。更早一点，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在167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但现代民俗学者认为，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并不可信。可信的是，古老的艺术现象怎样以古老的传统形式传承？怎样被地方群体加以新创造后传

① [爱沙尼亚] 于鲁·瓦尔克（Ülo Valk）著，董晓萍译：《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载朝戈金、董晓萍等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0—72页。

承？这正是现代艺术学和民俗学都要进行的工作。

第四，用民俗志的观点将文本化的历史文献转为文本的实践。我国傩戏文献缺乏，仪式音乐文献更为稀缺，但不是没有。这类文献留存下来，会经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历史。要用田野方法去考察历史文献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可是，田野工作者容易将所获得的音乐或戏曲表演文本当真，将之作为文本化的历史文件去处理，甚至试图去照样还原其在民间的实际表演活动，但这只是学者的假设而已，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个案法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文本与日常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文本的时间问题，而是在地方实践的空间问题。任何社会活动都有空间要素，空间要素不允许文本时间的任意延长。所以，我们在个案调查的空间中看艺术表演，对特定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而言，空间表演是有时间长度的，这个时间要符合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人们就要去休息，剩下的是神的时间或寺院的时间。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村民群体，当作者告诉我们，正月里村民去看孟姜女的傩戏表演，他们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散场，什么时候只剩下道士和戏班在没人看的时候仍在吟唱，我们就能体会到，这里面是有差异的，这也是对学者的过度文本假设的批评。

借此机会，我还想说几句题外话。在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我体会到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缘分。二十多年前，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得当时在答辩委员会中，有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在答辩到古代民间艺术理论的环节时，廖先生问我，民歌的艺术传承是否有其他独立因素，不止于民俗学的解释？我一听就明白，廖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出自他复杂而长期的研究。他精通德文和中外音乐理论，熟悉德国的民俗学传统，因此他看中国民间艺术会有不同一般的眼光和深度，这也正是钟先生请他来的目的。

我毕业两年后，开始协助钟先生编纂大学文科教材《民俗学概论》。钟先生圈定了一个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多学科作者团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科技史学。艺术学科作者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这部教材写了

八年，我也与乔先生交往了八年。他对中国乐理、器乐和声乐无所不能，出书也多，交稿也是最快的。他负责的那一组，还有专攻戏曲、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其他学者，也都是他请来的本行“八仙”，他们业务精专，同时也遵守结稿时间，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乔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著名语言学家肖璋先生的女婿。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学问好，还擅长京戏表演，据说有世传精通音律的功夫。他的女儿是钢琴家，还招了乔建中这个音乐理论家的女婿。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钟先生和我都在私底下叫乔先生为“乔老爷”。他脾气好，动不动就送我们一本新书，里面还经常会写到音乐与民俗的关系，让我们看了很爽。可以说，与乔先生的这段交往，直接产生了我国民俗学与艺术学交叉研究的教材成果。

对本书作者孟凡玉博士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我是通过英国音乐人类学者钟思弟知道的。有一首李健的歌叫《传奇》，我与钟思弟见面可谓一段传奇。1994年的一个下午，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他像一般欧美学者一样开门见山，坐下来就问我在河北定县调查秧歌戏对民间音乐的看法。他还说，他与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合作，搜集了河北民间乐社的宝卷唱本，里面有文字文本部分，需要继续做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直到最后也没问他是怎么找到我家来的？这种访问之奇特，让我见识了异国书呆子的风貌。他还给了我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不能回避宗教，二是他有一个中国的合作者叫薛艺兵，他很看重薛艺兵的才能和踏实的田野精神。以后，我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偶尔与钟思弟通信，他来信，我就回信，内容都是有关音乐与民俗表演的问题。我在英国时，他邀我去伦敦大学讲课，我还参观过他的工作室，那里布满了音乐设备和光盘架，几乎没处下脚。1997年底，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听人说薛艺兵就在香港中大学习，我便趁会议休息时间去拜访他，但别人说他暂时不在，我只好退回。就这样，直到2007年参加孟凡玉的答辩，我才终于在会上与薛艺兵教授第一次见面。不过说实话，因为有了钟思弟，我们好像早就成了老熟人了。

由于乔建中先生和薛艺兵教授的关系，后来我又认识了张振涛教授。他们都是好兄弟，满怀学术理想，多年合作奋战，开辟了中国音乐人类学

的一方圣土。他们当年取得的大批成果，轰动一时，也影响长远。我曾把钟思弟的遗憾说给他们听，他们便热情地介绍我去他们在河北易县的调查点做民俗学调查。以后，钟先生和我合招的一名博士生就以这个村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资料，撰写了民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在这个过程中，“钟思弟”是我们经常谈起的名字。

按字辈论，孟凡玉当属新科派的艺术学学者了。他的著作就要出版^①，让人看到国内院校的艺术学学科是新人辈出的。借此机会，我想借用老朋友王一川教授曾经演讲的央视“文化正午”栏目的名称，感谢所有已故的和健在的前辈曾经给予我的艺术学上的启迪，感谢孟博士的新著带给我的所有回忆和感慨。

祝福艺术学科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守住文化正午，保持丽日中天。

董晓萍

2013年7月7日

^① 孟凡玉：《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帷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是孟凡玉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首次推举评选出来的全国艺术专业优秀博士论文。该文现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推广中心和文化艺术出版社予以正式出版，作为孟凡玉曾经的博士生导师，我深感欣慰，也很愿意为这部颇有建树的学术著作写序作评。

常言道“文如其人”，这是常理。若反言之“人如其文”，这话应该也能成立。孟凡玉之文恰如孟凡玉其人，故而要评其文应该先说其人。

孟凡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时虽然已近“不惑”之年，不过进了校门就是学生。虽然同是学生，而他的师兄、学弟、学姊、学妹们却都喊他“孟老”。能得到这样一个略带调侃意味又显德高望重的尊号，不仅是因为他那厚道、真诚、稳重的人格品性，也不仅是因为他那不重修饰、老成持重的仪容外表，更多的是因为他那喜好读书的习惯以及由此造就的他那博学多识的涵养。孟凡玉读博期间，学习、生活的一个主要天地就是新源里研究生部宿舍一楼那个看上去很拥挤的小屋，屋子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好几个书架上层层叠叠满满摆放着的书籍资料——那是他千辛万苦从各处购买、复印、收集起来的个人“藏书”，其书种类之多、数量之丰堪比一个小型书库。本专业同学喜欢到他这里来讨论问题，缺什么书也可以从他这里来捡取，这里几乎成了学友们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孟凡玉的书绝不是为了装潢门面，而是他学术涵养的食粮，是他踏实、刻苦、勤奋精神的见证。

当然，读书只是读博的必由之路，但未必是成就学问的必然之路。虽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但“勤”向何处则更为关键。孟凡玉“勤”之路径，就在于拨开书山，面向田野，走进民俗生活实践中去饱览和读解草根

阶层那些无字之书。虽说孟凡玉早在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经跟随该院诸多名师接受了民族音乐学（亦即音乐人类学）的严格训练，打下了坚实的本学科理论基础，但田野工作的经验却远不如他对历史文献的积累和研究中善用文献的功力，这或许与他硕士论文是研究《红楼梦》中的音乐事项有关。而在博士学位论文的课题研究中，他下工夫最深也是收获最大的，莫过于从书斋走向田野，在两年中多次远赴贵池，并在当地山区度过两个春节，深入实地，细心考察研究对象，用心体验民俗文化，悉心解读民间音乐生活中的那些无字之书了。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亲临现场搜集第一手资料，不仅对避免因资料辗转而出现讹误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亲临现场在所经历的文化事件中亲身体验属于自己的那份文化感受。这一种感受，是阅读文字、观看录像资料都不可能获得的。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资料，但无法替代的是只有在田野中才能获得的真切体验和感悟。”

勤奋读书和苦做田野无疑是孟凡玉成功之路的两大根基，但是只有勤苦而无“悟性”同样难以成就学问。中国有许许多多勤勤恳恳做学问的人，他们常常喜欢用“学海无涯苦做舟”的古训来自勉、自嘲或自慰。而我一直认为，一个学者的成功之道，绝非只在“勤苦”二字，勤苦若无“感悟”去提升，则不能成就其学问。学术上的感悟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也是一种创作过程，它与文学创作、音乐创作有一定的共同性。不过，文学创作的内容可以是虚构的，音乐创作（作曲）更可以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声音创建，而学术创作虽然不能虚构，更不能无中生有，但它同样需要作者用灵气去组织材料、铺陈文章；用感悟去发现问题、发明概念；用创造性思维去创作出逻辑严谨、思路明晰、观点鲜明、富有创见的学术文本。我们通常说的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悟性”，就是这里所说的学术文本“创作”中的“灵气”和“知性”，也就是学者个人潜质中的学术领悟能力。当然，这种学术上的领悟能力，必定是以脚踏实地、刻苦钻研、身体力行、悉心领会为前提的。孟凡玉之所以具有敏锐的学术悟性，那是因为他勤奋读书而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知识；因为有了深厚的知识积累他才知道如何去刻苦钻研和身体力行；因为经历了刻苦钻研和身体力行才

会悉心领悟出其中的深意；因为悟出了其中的深意才能“创作”出成功的学术作品。

人既如此，文亦如此。那么，孟凡玉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究竟“创作”出了怎样的学术成果呢？说实话，我虽然指导了这篇论文的“创作”，但作者“创作”出的成果已经远远超越我的指导。所以说，我对其成果的解说不会很深透，只能就我个人的理解略评其一二。

孟凡玉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是雉仪音乐。雉仪活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同时还由于它广泛存续于今天而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因而长期以来对雉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研究中极富学术价值的一大课题。目前学界研究雉的文论很多，从历史、宗教到戏曲、音乐，可谓汗牛充栋。因而，选取什么角度、采取何种方法以及怎样进行研究才能出新，才能创造出不同于前人的学术成果，这是孟凡玉在选题过程中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作者最终选取了安徽贵池地区一个叫做荡里姚的村落作为研究对象，着重从人类学视角探讨该村历史上保留下来的雉仪音乐。按人类学或民族音乐学的说法，这是一种个案性质的研究，研究的是一个村落区域文化空间中的特定文化事项——雉仪及其音乐。

个案研究之所以成为西方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不仅因为这种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即研究者可以在前期做切实可行的田野工作，还因为这种研究可以对一个具体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现象描述并对其特性进行有理有据的解释，避免了概论式研究那种常见的空泛描写和主观概括。当然，由于中国的雉仪活动保留众多、分布广泛，荡里姚的雉仪与贵池地区其他许多村落的雉仪以及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保留的雉仪有着许多共性，荡里姚雉文化是中国各地千千万万个乡村雉文化的一个缩影，因而作者采取的不是仅就个案对象本身的孤立的微观研究，而是如他所说，是“宏观背景下的微观研究”。这种将微观个案与宏观多案相结合的方法，既能“以面说点”，又能“以点看面”，“点”（个案）“面”（多案）互补，在共时性研究方面，既可避免微观的局限，又可防止宏观的空泛。这种方法，在孟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此外,“以史论今”和“以今证史”应该也是孟文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民间口传文化(音乐及民俗)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对其历史源流通常较难把握。孟文在对贵池荡里姚傩仪及其音乐现象进行历史分析时,并没有单凭零星的口传资料虚构历史,而是通过大量存见的有关古代傩仪的史料记载,把中国古代傩仪绚丽多彩的发展历史与荡里姚傩仪的存活实例进行比对印证,不仅解释了荡里姚傩仪及其乐舞在历时性发展中的“压缩式”存续,而且从荡里姚傩仪及其乐舞的历史积淀中还合理地阐释了古代傩仪中的某些文化含义。研究一个村落文化空间中傩仪及其音乐的特殊续存,从特殊中观照全国各地的傩和历史上的傩,由此得出的结论,比以往那些面面俱到而无一可深知的“概论”式论著要可靠得多,也会深刻得多。

在文本写作上,作者采用当下人类学实验民族志中的叙述体(narrative ethnography)写作手法,把自己放入研究文本中,从田野调查的叙事开始,娓娓道来,文字朴实无华,描述真切可信。作者以坦诚的态度,既表达了自己深入田野的艰辛,又陈述了田野中获取资料的宽慰。并且文中还引入了作为故事主人翁的众多民间音乐家,以细腻的笔触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性情人格予以真实描述,给读者呈现出一幅生动感人的民俗音乐生活画卷。

以往许多研究民间音乐或民俗文化的论著,通常都以寻找和总结“规律”为己任,似乎只有研究出事物的某种“规律”来,才能算得上是一种“科研”成果。而孟文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作者借鉴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和符号学的新方法,用一种新的思路,把傩仪看做是一个象征和隐喻的符号世界,指出从整个傩仪活动到仪式中的每样物品、每件道具、每段乐舞、每出戏剧,“无不被赋予超越自身形态的象征与隐喻含义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这些以象征和隐喻方式呈现出来的文化符号之所以能够被世代传承和长久延续,正是因为这些以可感知符号形式存在的傩仪行为、傩仪歌舞、傩仪戏剧等,在其符号表象的背后隐含着实在的文化意义,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并且,这种隐含着文化意义和发挥着文化功能的符号,又是以其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过程不断改变着其象征、隐喻方式和文化功能效应的,即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因其“历史、社会、自然、个人”几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它并不是一种恒久不变的固定

模式。正是由于从这样的多维视角看问题，作者所要做的，就不是一味地去找寻和总结某种“规律”，而是面对这种民间仪式和仪式音乐，对其文化意义进行解释；对其文化功能进行剖析；对其文化变迁进行辨识。于是，“文化意义”（cultural meaning）、“文化功能”（cultural function）和“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便成了孟文研究思路的三个支点，对它们的理解、认识和分析也成了贯穿于全文的三条理论主线。

从人类学视角去研究音乐现象时，我们往往会因为强调宏观的文化背景而忽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这是长期以来音乐人类学（亦即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常见的一个通病。孟文则尽可能地将雉仪中的音乐（包括舞蹈、戏曲）本体与其文化脉络有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从荡里姚雉仪音乐旋律的“装饰度”探索了音乐概念与音乐历史的奥秘；从仪式中歌唱衬词“啰哩哇”中发现了当地及其他地区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从高腔、雉腔曲调形态比较中研究了音乐传播与变迁的规律；从雉仪“斩妖”乐舞的一个细节中发现了乐舞内容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等等。这些都使得论文在音乐本体与文化背景相联系的研究中有了新的方法论的突破。

除了上述那些较为宏观的理论把握外，在具体行文中也体现了作者具有很强的音乐人类学方法论意识。该文在总体的文本结构中，始终贯穿着人类学提倡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要求对文化表象的各种细节进行细致描述，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识别和解读表面现象从而对其本质含义进行深度描写。作者在对贵池雉仪活动的田野考察中就已经发现，由于当地雉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使得外来学者很难对它进行准确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正如作者所说：“在其大量相互层叠、相互交织的复杂概念结构中，有许多是令人陌生的，有些是含混不清的，有些则是非常曲折隐讳的隐喻表达。”这些曲折隐讳的隐喻表达，需要学者在细致的田野考察中去入微地加以体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文本中虽然对各种细小事例进行了尽可能原样的呈现，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表面的细致描述上，而是在为读者呈现出具体实例之后再进一步通过解读识别和深度描写来“还原”文化的本意。文章正是通过这些不厌其烦的细节描述和解读式的深度描写，还原性地呈现出荡里姚雉文化的丰富内

涵——这些内涵并非来自局内人的直接叙述，而是来自作为局外人的作者的分析 and 解读。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说：“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解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文化的解释》24 页）或许，民族音乐学者都知道应该这样去做，但是，能不能做得到或做得好则因人而异，更是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和见识。孟凡玉因为有了知识的丰厚积累，见识的敏锐和感悟，方能从表面上鸡毛蒜皮的那些小事中识别出以象征和隐喻方式隐含于表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纵观全文，方法和思路在文本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作者所言，“共时与历时相互结合，局内与局外相互参证，局部与整体相互关照，纵向与横向相互综合，以多重视角阐释研究对象的存在及其文化意义”，正是这篇学位论文学术创新的要点之所在。实际上，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都融汇在以三十余万字铺陈的各个具体章节中，而在总括全文的最后一章中，作者除了归纳出九点总体结论外，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以头戴面具的乐舞表演为典型特征的傩仪活动中所存在的“假”与“真”、虚与实、神圣与凡俗等意义和功能方面的对立统一原则，最后提出“假面真情”这一关于荡里姚傩文化以及中国所有傩文化的核心命题。

对于文章中丰富的具体内容和诸多的学术创见，我难以在这篇序词中一一尽述，即便如此，也许是出于导师的偏爱，我在这里已经过多地肯定了这篇博士论文的突出成就，好在我的评价还没有超出本学科方向的范围。不过，这篇博士论文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已经突破本学科，得到了许多非本学科学者的高度评价。在这里，不妨让我来抄录一段著名民俗学家董晓萍教授对孟凡玉这篇博士论文的审阅评语，以此作为本序文的结语。董教授评价说：“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博士论文，而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这种研究，不仅对音乐人类学有建设的意义，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有相当的理论辐射意义和方法论的启示。”“其成果将为今后开展其他方面的村落空间文化的研究树立一个典范。”

薛艺兵

2011 年 2 月写于北京

序 一 艺术学的文化正午 董晓萍 …… 1

序 二 薛艺兵 …… 8

绪 论 …… 1

一、课题研究意义 …… 1

二、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几点基本预设 …… 5

三、雉研究概况及成果综述 …… 13

四、基本概念의初步界定 …… 17

第一章 村落中的文化表演

——田野考察工作及荡里姚雉仪式活动纪实 …… 20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村落概况 …… 20

一、地理位置 …… 20

二、气候与物产 …… 23

三、村落历史 …… 25

四、村落现状 …… 26

第二节 田野工作：实地考察与感悟 …… 28

一、初下江南的深刻记忆 …… 28

二、南昌追踪 …… 31

三、特殊时刻的特别感动：第一次在山里过除夕 …… 33

四、只有两个“观众”的演出 …… 34

五、一点感想：田野工作，无可替代的是体悟 …… 35